

俄国



高尔基集

20世纪

外国文化名人

书库

高尔基集

余一中 编选

上海远东出版社

责任编辑 殷卫星

封面设计 赵小卫

奥尔图集

ER SHI SHI JI

WAI GUO WEN HUA MING REN SHU KU

余一中 编选

出版 上海远东出版社

开本 850×1168 1/32

(上海冠生园路 393 号 邮编 200233) 印张 13.75

发行 上海远东出版社

千字 360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插页 4

排版 上海希望电脑排印中心

版次 1997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

印订 上海长阳印刷厂

印数 1-3000

ISBN 7-80613-393-3 / C·22

定价: 19.00 元

20 世纪外国文化名人书库 总序

季羨林

一个人,一个组织,一个国家,在永恒不断流逝的时间的长河中,到了一定的时候,应该回头看一看,看看走过的历程中自己走得是否都完全正确,正确的要坚持,不正确的要扬弃。这是十分必要的。我们古人在这方面有许许多多的教导,最为大家所熟知的是“前车覆,后车戒”,通常作“前车之覆,后车之鉴”。这两句话表面讲的仅仅是反面的经验,也就是教训。但是其中隐含着“前车不覆”也是“后车之鉴”的正面的经验。

所谓“一定的时候”,可能短到只指一天,而长则是无限制的,一般的是一年,十年,百年。如果制订几年计划,则在计划结束后,也必须回头看一看,算一下总帐,目的都在回顾前车之覆或不覆以决定后车如何走法。

当前,我们中国的国家和人民,以及全世界的国家和人民,都正处在一个新的“世纪末”中;再想得远一点,是处在一个新的“千纪末”中。这是一个非常的关键时刻。我在很多地方都讲到过,世纪或千纪都是人们人为地制造出来的,没有什么先天的必然性或必要性。试想:如果没有耶稣和耶稣教,哪里来的什么“世纪”和“千纪”。但这只是事情的一面。事情的另一面则是:既然人们制造出来了“世纪”和“千纪”,它们就起了作用,而且正在起着作用。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

世纪末和千纪末,现在都不是第一次。然而全国和全世界都承认,眼前的这个世纪末和千纪末同过去的都不一样。由于

科学技术的惊人的进步,特别是交通通讯工具方面的突飞猛进,用一些人使用的形象的说法:世界变得越来越小了,产生“蝴蝶效应”等等的理论,决不是偶然的。已覆的前车历历可数。当前世界各国政府和一些有识之士高呼“环保”,其声震天动地。这决不是没有根据的,这也让我们这些忧天的杞人感到点安慰。然而,就我个人浅见所及,高呼“环保”而不从事实的发展中,特别是从思想的高度和哲学的高度上,来探索环境之所以必须保护,环保工作之所以是火烧眉毛的紧迫工作的根本原因,这有点舍本逐末的意味,实在为愚陋如不佞者所难以理解。

总之,我们眼前所处的世纪末就是这样的一个世纪末。

我在本文一开头就谈到,到了一定的时候,一个人,一个组织,一个国家就应该回头看一看,看一看在过去一段行程中车行和车覆的经验和教训,以决定今后的走法。现在正是这样的的时候了。而且,我认为,应该回头看的不仅仅是一个人,一个组织,一个国家,而是整个的世界。

正在这样关系到人类前途的关键时刻,上海远东出版社不惜人力物力,编辑出版了一套“20世纪外国文化名人书库”,实在是顺乎潮流,应乎人心的壮举,我想,谁也不会吝惜对此举的赞誉。出版社提出的方针,虽然重点是放在人文精神上;然而,大家都会理解,人文精神是指导人类社会前进的关键精神,它是龙头,它同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物质的和精神的努力,是密不可分的,抓住人文精神这一条纲,则纲举而目张,提要而勾玄。这实在是一个非常聪明的打算。

为什么单单举出“外国文化名人”呢?中国《诗经》上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句富有哲理而又明了形象的话,千百年来,为中国人民所接受,广为流传,几乎家喻户晓。远东出版社之所以选外国名人,我想其故就在这里。

对于入选的这几十位“名人”中的某一些人,中国学术界肯定会有不同的意见。这是很自然的事,不足为怪,不这样才是怪事。但是,我相信,对绝大多数的入选者来说,大家都会同意的。这些名人,时代有先后,治学有专精,影响有大小,造诣有高低。

但是，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过去一个世纪世界人文精神的发展，则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常讲，对世界上万事万物都要一分为二。对这些“名人”，当然也不能例外。我们一定要分清他们思想中的精华与糟粕，以便决定我们的去取。这话实际上已成为老生常谈，不用我说，大家也会明白的。

但是，我们拿一个什么样的标准来分清精华与糟粕，来决定我们的去取呢？精华与糟粕，说起来明白如日月经天；但实则是泾渭并不分明，而且随时代的推移，有时候还会转化，我们决不可掉以轻心。我个人的想法是：标准只有一条，那就是“以我为主”，不能喧宾夺主；以我们目前的需要为主，决不能陈义过高或过低，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或者甚至幻想。那样是有害无益的。

我们目前的需要是什么呢？我们是一个有十二亿人口的大国，目前正在进行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这是一件空前伟大的工作。直接的借鉴，中国没有，外国也不会有。但是，间接的借鉴，就算是“前车之覆”吧，则是能够找到的。我说的“以我为主”，就是指以我国当前的实际为主。外国名人的思想中，对这个当前的实际有用的，我们则吸收之，否则则扬弃之。这是天经地义，用不着探讨与辩论。

但是，非常遗憾——至少我这个喜爱忧天的杞人觉得遗憾——，我发现我们学术界少数人有一种不正之风，“不正”二字加起来就成为“歪”字，说不好听一点就是“歪风”，还需要再加上两个字“邪气”，才算完整。他们膜拜外国“名人”，或者并非“名人”，或者在成为名人之前已经销声匿迹的“预备名人”，拜倒在这些人的脚下，战慄兢兢。一听到中国人有什么新的理论，就笑得连鼻子都想笑歪，鄙夷之态可掬。用“崇洋媚外”这个词儿，有点刺耳，就改用一个比较文雅一点的“贾桂思想”吧。在这些人眼中，只有外国人才有资格，才有能力，有天才，才有权利来创建新理论。在国际学坛上，中国只能成为一个“无声的中国”。对于这种现象，我实在觉得悲哀而又凄凉，可叹而又吃惊。

我对眼前外国的各种学科的新理论要说知道得很多，那不

是事实,而是吹牛。要说我一点都不知道,那也不是事实,而是撒谎。我对这些新理论了解一个大概起。有些新理论,就像时装一样,“螭蛄不知春秋”。我曾套用赵翼的两句诗:“江山年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十天”。说明我对这些风起云涌转瞬又风吹云散的所谓理论的看法。对待这些新理论,我的态度是:我们必须学习,必须弄通,然后实事求是地予以公允的评价。拒而不学,决不应该;顶礼膜拜,大可不必。后者不应该是一个学人,不管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学人应有的态度。眼前我们最重要的工作是彻底扬弃“贾桂思想”,还我一个堂堂正正身。

现在,这一套“书库”已经整整齐齐地摆在我们眼前了。国外的原作者都可以算是“名人”。书中包含着他们的智慧,当然是精华与糟粕并存,经验与教训共处。我们应当怎样对待这一套书呢?我个人认为,我在上面刺刺不休地讲的那一些话,就是我们对待这一个书库的准则。首先,书中必有“前车之鉴”,关键在于我们怎样去识别和利用。其次,这一些书都是“他山之石”,我们用它来“攻”我们的“玉”。第三,“以我为主”,以我们当前的需要为主,这一点无论如何也不能忽视。我们要按照我们当前的需要,来细致鉴别书中的精华与糟粕,以决定吸收或者扬弃,主动权完全掌握在我们手中,这一点是含糊不得的。如果某一些富于“贾桂思想”的人士,在膜拜当今外国那一批风云变幻,乍起又落的“名人”、“准名人”或“候补名人”之余,又来膜拜这一批已经成为“名人”的大菩萨,则我期期以为不可。是为序。

1997年8月12日,北京

林贤治

时间的发现与分割,无疑是人类伟大的文化智慧之一。世纪,作为一个长时段,必然穿透个人而接连更多同类,抵达辽阔的界域,承载且激荡着丰富的内容。世纪令人怀想全人类。时间与空间有一种庄严的对称。

此际,我们即将到达 20 世纪的入海口。

远溯世纪的源头,便见绝壁重渊,狂流乱注。两次世界大战,漫过短暂的空隙地,蜿蜒至半个世纪;虽然最终为人类意志所遏止,留下的废墟毕竟是巨大的。奥斯威辛至今不长青草。19世纪,共产主义幽灵犹在西欧徘徊,这时屹立东方,热烈而坚定,恰如停泊在涅瓦河畔的“阿芙乐尔”;为十月革命犁耕的土地,崛起苏维埃政权,继而又红了欧亚一大片,甚至点染了美洲金瓯一角。30年代经济大危机过后,几十年间,不复发生如此惊险的故事。“看不见的手”在加紧运作。所谓“晚期资本主义”,仿佛已经穿越有关垂死的预言,平稳进入卡恩所称的“大过渡”。及至80年代末,苏联东欧遽然发生戏剧性演变,致使那些历史的过客在柏林墙的坍塌声中纷纷谢幕。所有这一切,其实仍然不能称作“意识形态的终结”。社会主义以其固有的力量,使东方一个传统深厚的民族,在现代化变革的进程中,保持独特的丰姿。

整个当代科学,与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经济结构以及人们

联系方式、生活方式、斗争方式等等,有着密切的关联。尤其是政治,影响更为直接。与此同时,科学也以其内在的动力,给予社会以影响,甚至充当变革的先导。作为 19 世纪晚期至 20 世纪早期的科学文化的产物,现代医学、无线电、汽油发动机、相对论、大规模生产的现代化形式,对社会的影响是至深且巨的,20 年代量子力学的新生,尤其突出地显示了科学的现代性。50 至 60 年代,核子物理和原子能的应用;60 至 70 年代的自动化和控制论;70 至 90 年代,计算机、微电子技术、人工智能的应用和推广,所形成的冲击力更是前所未有的了。总之,愈到了后来,科学技术的发展便愈加迅猛。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也同样发生了许多富有时代特点的变化。各种新兴学科,边缘学科,交叉学科不断出现;裂变,渗透,整合同样进行,互补性原理成了背后的强有力的支架。整个当代科学,处于高度综合又高度分化的趋向之中。习惯性思维,正统的观念意识,现成的定律及范式之类,遭到进一步的怀疑和挑战:绝对权威不复存在。封闭是愚蠢的。个体性,差异性,偶然性不容忽视。没有万古长存的事物,因此变革不能停顿。打破现存的秩序,从无序到有序。统一并非操纵,它仅只意味着事物间的某种关联。既有控制,必有反控制,如此才构成了“系统”……普利高津在描述最近 20 多年来自然观发生整体的断裂时,指出:这种断裂绝不可能是某一单独领域造成的结果,而是广泛的现象,产生时带有爆裂声,并且可以扩展。爆裂的声音虽或遥远,微末,隐约有闻;然而它是切实的,所以能够鼓舞心灵,使我们感知未来的震荡。

自从罗马俱乐部的报告问世以后,人口问题,粮食问题,能源问题,环境保护及生态平衡问题,还有海洋及空间问题等一系列“全球性问题”,开始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未来学界,各种极端的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的论调都出来了。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已被告知:科学本身潜在着使徒和魔鬼两种力量,而且一直处于冲突之中。当科学技术走向成熟,或者说,当它从掌握自然力量进而左右人类生活时,文明危机便随之发生了。

所谓文明危机,其实是意义危机,价值危机。因此,如何从

事文化主体的精神品格的建设,是横亘在我们与时代之间的一个严重的问题。

知识分子是科学文化的发掘者和播种者,是精神文化的体现者和改造者;但同时,又是社会危机和历史责任的一大承担者。

古代的人文学者曾为贵族和教会写作,自然科学家为雇主工作,直至 15 世纪,科学和艺术仍然沦为神学的婢女,我们很难从中窥见人文精神的闪烁的微光。欧洲文艺复兴以后,情况渐渐有了改变。经验科学正步进入信仰的地盘,驱赶其间的迷雾,理性之光使认识升华;虽然后来有着对“非理性”的阐扬,而其实,那是对无视人类更广大的精神领域的专断与僭妄的理性的抗议罢了,结果维护了人性的健全。自近代以降,科学文化不断获取“新工具”,但最重要的莫过于寻找灵魂。知识分子以其创造性劳动服务于人类,在体现自身价值的同时,表达了对社会的关怀。由于知识分子的理性自省能力的增长,人文思想的血脉非但不会中断,二战以后,特别在今天,对于人类,人的本质,人的命运以及未来的关切,几乎成为知识界压倒一切的主题。

今天,我们着手编辑“20 世纪外国文化名人书库”,本意在于通过个人选集的组合方式,显示接连几代知识分子的基本风貌,勾勒出本世纪人文思想发展的大致轮廓。这是初步的素描,尚谈不上严整的巨幅壁画。

前人有“万有文库”,万物皆备于我,可谓懿欤盛哉;但以我们的能力和条件,大抵只好择取一组组断面了。自然,不求完备也未尝不可以算是一种选择。外国近代思想的译介,已经有一个世纪以上的历史了,可是,多少经典性作家,至今没有他们的译本,甚至连名字也鲜为人知。对于一个文化大国来说,这是很不相称的。庞德说,伟大的文学世纪必然是翻译世纪。广而言之,文化也一样。有鉴于此,当我们做着世纪性的文化总结时,就决意把国内的部分割让出去了。剩下的工作,也就是手头要

做的工作,用鲁迅的话来说,还是叫“盗天火”罢。

作为这样一套大型丛书,本当不限于文化积累的;最根本的目的,仍在于现代文化的重建。当此全球信息一体化的时代,民族文化的发展,必然以世界文化为背景;我们唯有汲取异质性的思想观念,文化知识,人文素养,才能从一个先天的传统的体系内部,创造出有利于保存、发展和完善我们自己的良好的生态环境。

这部“20世纪外国文化名人书库”在上海出版,使我们深怀一种温暖,遥遥缅想那里的创榛辟莽、筚路蓝缕的一代翻译界先驱。在中国现代化的启蒙时期,他们为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全国的译书中心——所凝聚,口述笔译,中外参证,推敲译名,另铸新词,掀起了西学东渐史的第一页。

有一部日本思想家撰写的著作《20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于1901年在我国翻译出版。出版后,即遭政府当局查禁。1927年,曹聚仁先生将它重新标点出版,赞叹道:“在25年前,中国学术界已有人来译述这一类读物,真可使我们现在人十分惭愧。”比起时代要求于我们的,我们着实做得太慢了,太少了。

在又一个世纪的钟声即将鸣响的前夕,谨以此书库为人类思想文化生生不息的洪流作涓滴奉献。

1996年7月,广州

编者前言

高尔基是 20 世纪俄国的伟大作家,也是 20 世纪世界的伟大作家与思想家。

翻开前苏联的《简明文学百科全书》及我国的类似图书,我们都可以看到关于高尔基的这类评价:“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奠基人”、“苏联文学的鼻祖”。在我国高校的外国文学史和俄国文学史教科书中,高尔基也大多是被当作“革命的‘海燕’”、“长篇小说《母亲》的作者”来介绍的。自 50 年代以来,在我国读者的心目中,高尔基是这样一种形象:他出身贫贱,凭着自己的天才,成了无产阶级的文学代言人,除了曾一度“受资产阶级的影响”表现出一点后来很快就改正了的“动摇”外,他一直在用自己的笔热烈地呼唤革命(在十月革命前),坚定地维护革命建立起来的制度。在错综复杂的国内社会政治斗争中,他“旗帜鲜明”地主张:“谁不和我们在一起,就是反对我们”,“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这种对高尔基的理解是与 50 年代我国读者的期望相联系的:刚刚站起来了的,正在建设自己的共和国的中国人民期望着从无产阶级文学的权威那里找到苏联“老大哥”有效地建设新生活的经验和新的价值观。几乎是从苏联照搬过来的文学宣传、文学教学机制也决定了我们应当读和不应当读高尔基的哪些作品,应当用什么样的标准去衡量高尔基的作品,从而不断强化了对高尔基的简单化、概念化的理解。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的眼界拓展了,我们的作家、文学家和读者发现,文学的辽阔天地——古代的和现代的,中国的和外国的——决不是两三本“样板”小说所能填满和概括的,它是那样的博大深邃,那样的五光十色。

与此同时,高校外国文学课教师给苏联文学与高尔基留的时间却越来越少,一些学者对苏联文学(严格地说是对一部分苏联文学作品,即前苏联官方推崇的文学作品)采取了愈益深刻的批判态度。高尔基作为所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在前苏联与我国的学术界分别受到了“阻碍苏联文学的发展”和“阻碍中国文学的发展”的指责。

怎样引导读者阅读苏联文学作品,对苏联文学(现在国际上采用了较为深广的术语——20世纪俄罗斯文学)应作如何评价?这是值得文学评论界和学术界认真探讨的大问题,不是这里所能讲清楚的。但是,在这本《高尔基集》的开场白中给这位世纪的伟人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却是必要的。

高尔基出身贫寒,童年时开始遍尝生活的艰辛,少年时代起就在“人间”和生活的“大学”里看到了世态的炎凉。他曾有好几年在俄罗斯大地上漫游,无数次变换自己的职业,但终生未变的一点是,不断地从书籍这一知识的源泉中汲取营养。按照我们中国的传统说法,这种靠“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得来的对社会与人生的认识是大智慧。有这种大智慧的人不易受骗,他能够洞察世事百态,甚至能够看到被绚丽的未来之幕遮盖的明天和后天。

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中期的一百多年中,知识分子与人民的关系一直是俄国社会的一个重要问题。觉悟较早的知识分子最初是脱离人民,因此无法行动,不善行动,被称作“多余的人”。后来,出身贵族和市民阶层的民粹主义知识分子为了消除在出身与教养上同工农阶级的差距,取得他们的信任,为了显示他们同人民,主要是农民的一致,则把人民和人民中的某一部分人,甚至处于宗法制度下的农民加以理想化,奉为生活的老师。在前苏联,这种民粹主义常常发展为迁就人民的缺点、错误,向

精神的粗俗与贫困看齐的倾向。高尔基是从流浪汉成长起来的“大知识分子”，是来自人民底层的作家，他在抨击沙皇专制，揭露剥削者的罪恶及各种社会丑行时，不用担心人民怀疑他的真诚，他无须刻意作态地显示自己同人民利益的一致。因此，用鲍·扎依采夫的话说，高尔基具有一种托尔斯泰式的“农夫的贵族精神”。这里“贵族精神”一词不带贬义，而是指对事物的独立不凡的见解及待人处事时刚正不阿的自主意识。凭着这种“农夫的贵族精神”，他批判沙皇的反人民政策，鞭笞地主和资本家贪婪、残酷、虚伪的本质，同时也嘲笑和讥讽他所属的劳动人民身上的痼疾，并且把它们看作旧制度的毒素。

高尔基在少年时代就同革命者有过接触，在青年时代又亲身参加了革命运动；在成名之后，他一直给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运动以巨大的物质和道义支持。他还曾经是一名布尔什维克党员。但是高尔基不只是因为阶级出身和“阶级感情”成为革命者的，他是靠着知识的翅膀从社会底层上升到他那个时代的思想巅峰的。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是科学，是民主，是解放全人类的人道主义。他认为，“真正的、永久的革命者”应当重视文化建设工作，应当用科学、民主的马克思主义在无产阶级的做长久细致的启蒙工作，让他们懂得解放全人类的使命，在建设新的生活形式的同时培养自己对非人道行为的厌恶，建立新的思想观、道德观。

对社会生活的深刻了解，独立刚正的批判精神和对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人类精神文明成果的崇尚，构成了作为思想家和文学家的高尔基的生平与创作的三个特点。只有从这三个特点出发，我们才能够比较客观公正地评价高尔基的文学创作和社会活动。

从三个特点出发，我们可以看到，高尔基的创作是 19 世纪 70 年代至 20 世纪 30 年代俄国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在这一历史时期的上下 60 年间，各种社会人等——上自尼古拉二世、列宁这些国家元首，中到沙皇大臣、市长、苏维埃人民委员、莫罗佐夫、列夫·托尔斯泰等社会名流，下至社会“底层”夜店的妓女

和苏俄监狱的囚犯,以及许多历史事件——大自 1905 年革命、1917 年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中到 1896 年下诺夫哥罗德的全俄博览会、一个家族的兴衰史、对工人领袖的审判案、李鸿章访问俄国,小至民间的生丧嫁娶、流浪儿的行乞等等——无不通过高尔基的妙笔形象地展现在读者的面前。

我说高尔基的创作是“百科全书”,不仅是因为他所描写的人与事种类繁多,无所不包,更重要的是高尔基吸收了他所在时代的自然科学、哲学、美学的最新成果,广泛借鉴了普希金、巴尔扎克、列夫·托尔斯泰、车尔尼雪夫斯基、列斯科夫、契诃夫、费·索洛古勃、巴比塞、罗曼·罗兰等人的艺术技巧,用其独特的形象思维极大地拓宽了其作品文本的艺术空间,使文本包含的不确定性与空白大为增加,意向含蓄、广博,具有多义性,能动的读者可以从阅读高尔基的作品中得到恩格斯阅读巴尔扎克小说时的体会^①。

总之,高尔基不仅没有“阻碍苏联文学的发展”,而且继承、发扬了普希金、托尔斯泰以来的俄罗斯文学的优秀传统,并把这种传统交给了后来的俄罗斯作家。

我国和国外的读者们之所以会对高尔基和他的作品产生误解,究其原因有三:首先,是由于高尔基因被加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与批评奠基人的称号而带来的某种歪曲和误导。事实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概念是斯大林 1932 年春钦定^②,日丹诺夫^③加以阐发的。在高尔基死后,他被说成了这一主义的奠基人,实在是别人“为了打鬼,借助钟馗”,用高尔基这一文

① 恩格斯在致玛格丽特·哈克奈斯的信中说:“我从这里(指从巴尔扎克的小说里——编者注)……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7 卷第 42 页。

② 徐振亚译《格隆斯基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信》,见倪蕊琴主编《论中苏文学发展进程》,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 年,第 344 页。

③ 日丹诺夫(1896—1948)——苏联党务活动家,曾参加过十月革命,1934 年起任列宁格勒市委与州委书记,1939 年起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学权威的声望，来推行自己的主张^①。其次，高尔基的许多作品，尤其是十月革命后创作的作品，包括回忆录《列宁》，在发表时都受到了删节与修改。更有甚者，他的大量的政论作品、书信等长期以来一直尘封在绝密的苏联档案库里，不得与读者见面。然而这些作品恰恰反映了这位伟大作家关于文学创作、人生与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深刻而又大胆的思想。再次，对于公开发表的高尔基的作品，如前所述，50～60年代的出版发行、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宣传、文学教学机制做了片面的引导。这种机制一方面浅化了高尔基作品的意向深度，削减了作品的多义性；另一方面视读者为阿斗，不去激发他们的审美能力和认识能力，以最大限度地接受高尔基作品所蕴含的多方面的精神价值，而往往把高尔基的创作与贯彻眼前政策的应景任务捆在一起要读者“联系实际”地接受高尔基。这样的“高尔基”自然要影响我国的文学发展。但问题显然不出在高尔基，这样接受来的高尔基是一个被歪曲了的高尔基。

我们这本集子是还读者以一个完整的高尔基的初步尝试。高尔基留给后人的文学遗产宛如一片浩瀚的大海，仅苏联1949～1956年间出版的远不是全集的《高尔基文集》就有30卷。从那时到今天又发表了大量的当初未收入30卷文集的高尔基的作品。要在如此广阔的文字海洋中选出三十几万字来代表高尔基的创作的的确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为了做好这一尝试，我为这一集子的选编工作定了两条原则：一是尽量考虑到入选作品在题材、体裁、思想内容和艺术手法上的多样性，二是略已知之所详，详已知之所略。

因此，收入本集的有作家早期的浪漫主义小说和诗；有作家中期写的政论和运用伊索语言，吸收象征主义手法创作的童话；也有作家晚年的地道现实主义的回忆录、文论、书信。从为人类光明而牺牲自己的超人丹柯、自由的流浪汉切尔卡什，到工运领

① 关于这一点汪介之先生在《俄罗斯命运的回声》（漓江出版社，1993年）一书的《“日丹诺夫模式”的创始人？》一节中有详尽的论述。

袖巴维尔、革命导师列宁等人物形象的长廊中,我们可以看到高尔基从向往光明,到坚信社会主义,同时又痛苦思索理想与现实的矛盾的心路历程。

特别应当指出的是,本集中收入了我国读者以前未曾读过的高尔基的作品,这些作品的发表在俄罗斯也只是最近几年的事。这些作品有政论文《两种灵魂》、《不合时宜的思想》(节选),给列宁、罗曼·罗兰、丘科夫斯基、亚戈达^①、斯大林等人的信。《两种灵魂》集中反映了1905年革命后高尔基对俄罗斯民族精神的长达十年的深刻思考,同时也是一篇具有真知灼见,但也不无偏激的东西方文化比较论文。《不合时宜的思想》在前苏联曾被禁读达70年之久,直到1988年才重新出版。在这部写于十月革命前后的著作中,一直向往革命、呼唤革命的高尔基冷静地分析了与革命大潮相伴的将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的过程,尖锐地批评了暂时的革命者(真正的假革命)破坏法制、滥用暴力、摧残文化的罪行,热烈地呼吁发展生产、尊重文化、尊重科学和知识分子、弘扬人道主义、建立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高尔基像今日的后现代主义者那样自嘲地把这些想法称作“不合时宜的思想”,确实其中也有一些失之偏颇之论。但可以说,1921年,列宁正是吸收了高尔基的若干“不合时宜的思想”才制定了新经济政策,贏来了20年代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和经济的复苏。列宁逝世后不久,斯大林停止执行新经济政策,使《不合时宜的思想》中所批评的社会弊病重又蔓延开来,为日后的苏联解体埋下了隐患。

高尔基给列宁、亚戈达、斯大林的信驳斥了某些人所谓“高尔基是斯大林国内倾轧的帮凶”的说法;高尔基对国内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受害者充满了同情,为他们奔走,求情,千方百计减轻他们的苦难。高尔基给斯大林的信是用公事公办的公文语体写成的,他同斯大林打交道是因为他知道,他要做的事离开斯大林

① 亚戈达(1891—1938)——苏共党员,曾任国家政治管理总局副主席、内务人民委员等职,后在党内倾轧中丧生。